



窮理致知

《資治通鑑》的反諷手法

：以隋煬詔書為例

● 施寬文*

中國傳統史家撰著史書，一向重視政治、軍事、經濟之得失鑑戒、人情事理的是非評價，較少出於單純的學術研究興趣，如明末大儒王夫之所云：「所貴乎史者，述往以為來者師也。為史者記載徒繁，而經世之大略不著，後人欲得其得失之樞機以效法之，無繇也。則惡用史為？」（《讀通鑑論》卷六）。司馬光編撰《資治通鑑》，由書名即可知其明確之目的，亦即：「關國家盛衰，繫生民休戚，善可為法，惡可為戒」（〈進書表〉），固著眼於政治與人事之法戒褒貶，因此，除了詳述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以明因果，更於事理、是非之緊要處，援引前人史論或以「臣光曰」現身評論，使讀者能夠明白其中的是非得失，全書史評多達 218 篇¹。

除了史家主動現身評論歷史人事，《通鑑》書中也有不少隱性的批評，這些批評或隱藏在文本語境、脈絡之中，或是在史家採用的史料裡，例如「詔書」在《通鑑》的敘史中，時有對於人事的反諷意味。所謂「反諷」，指「表象和事實的對比。包括：表面上講的是一件事，骨子裡指的是另一件相反的事，以及事與願違的矛盾事實。」其目的是為了「舉發剛愎的無知、自以為是的愚蠢、驕傲、浮華與偽善等等。」²以隋煬帝為例，觀諸《通鑑》所載其詔書與其行事，則其言行之矛盾與為人之浮華偽善，不

* 施寬文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。

¹ 數目係據施丁：〈司馬光與資治通鑑〉（代序）之統計。見《資治通鑑大辭典》（長春：吉林人民出版社，1994），頁 14。

² 黃慶萱：《修辭學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1989），頁 321、頁 326

言而喻。

司馬光在《稽古錄》中評價楊廣云：「煬帝以悖逆詐謀，坐承富強之業，志驕氣溢，慨然慕秦皇漢武之為人，窮侈極欲，連兵四夷，政繁賦重，盜賊蠱起，而游幸不息，以樂滔憂，惡聞直言，喜自壅蔽。」³《通鑑》則云其為人善於「矯飾」（卷 179），蓋楊廣為人虛偽而剛愎，性喜奢靡，欲壑難填。《通鑑》載其於仁壽四年（604）十月剛即位時，下詔書指示在伊洛營建東京之事云：「宮室之制，本以便生，今所營構，務從儉約。」（卷 180）未及半年，在大業元年（605）三月又下詔：「聽採輿頌，謀及庶民，故能審刑政之得失；今將巡歷淮、海，觀省風俗。」（卷 180）詔書中的隋煬形象，儼然為儉樸愛民的勤政明君，然而，《通鑑》隨後即就隋煬詔書中的「儉約」與「重視民意」之言，極力鋪陳其實際行事。除了「營建東京，每月役丁二百萬人」，其營造顯仁宮，「南接阜澗，北跨洛濱。發大江之南、五嶺以北奇材異石，輸之洛陽；又求海內嘉木異草，珍禽奇獸，以實園苑。」至於隋煬所謂欲「謀及庶民」而有的「巡歷」之舉，除了事前「發河南、淮北諸郡民，前後百餘萬，開通濟渠。……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，自山陽至楊子入江。渠廣四十步，渠旁皆築御道，樹以柳；自長安至江都，置離宮四十餘所。」（卷 180）不僅「巡歷」路線的交通建築與沿途離宮之構造，已是擾民不堪，其後更是「丁男不供，始役婦人」（卷 181）；另又「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。東京官吏督役嚴急，役丁死者什四五，所司以車載死丁，東至城皋，北至河陽，相望於道。」（卷 180）則已是殘民虐政！

此外，隋煬詔書中所指示的營構宮室「務從儉約」，《通鑑》在其即位後七個月的西苑建築中，又揭明其實際情形：「五月，築西苑，周二百里；其內為海，周十餘里；為蓬萊、方丈、瀛洲諸山，高出水百餘尺，臺觀殿閣，羅絡山上，向背如神。北有龍鱗渠，縈紆注海內。緣渠作十六院，門皆臨渠，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，堂殿樓觀，窮極華麗。宮樹秋冬彫落，則翦綵為華葉，綴於枝條，色渝則易以新者，常如陽春。沼內亦翦綵為荷芰菱芡。」（卷 180）對其詔書所謂「謀及庶民」而有的水路巡行視察之舉，則在其啟程後著意加以描述，以諷刺其所謂「巡歷」實為「遊歷」：

龍舟四重，高四十五尺，長二百尺。上重有正殿、內殿、東西朝堂，中二重有

³ [宋] 司馬光著，[美] 王亦令點校：《稽古錄》（北京：中國友誼出版公司，1987），卷 14，頁 470。



百二十房，皆飾以金玉，下重內侍處之。皇后乘翔螭舟，制度差小，而裝飾無異。別有浮景九艘，三重，皆水殿也。又有漾彩、朱鳥、蒼螭、白虎、玄武、飛羽、青鳧、陵波、五樓、道場、玄壇、板闌、黃篋等數千艘，後宮、諸王、公主、百官、僧、尼、道士、蕃客乘之，及載內外百司供奉之物，共用挽船士八萬餘人，其挽漾彩以上者九千餘人，謂之殿腳，皆以錦綵為袍。又有平乘、青龍、艨艟、舳〔舟爰〕、八櫂、艇舸等數千艘，並十二衛兵乘之，并載兵器帳幕，兵士自引，不給夫。舳艟相接二百餘里，照耀川陸，騎兵翊兩岸而行，旌旗蔽野。所過州縣，五百里內皆令獻食，多者一州至百舉，極水陸珍奇，後宮厭飫，將發之際，多棄埋之。(卷 180)

除了法戒資治，司馬光編撰《資治通鑑》的另一目的是「刪削冗長，舉撮機要」(〈進書表〉)，而書中以工筆細細繪出隋煬宮苑建築、水路巡歷之奢華浪費，並非辭費，實欲藉以對照其詔書中的儉約、愛民形象。《通鑑》云隋煬為人：「臨朝凝重，發言降詔，辭義可觀；而內存聲色」(卷 181)，縱觀隋煬恣肆的「聲色」行徑，其「可觀」的詔書「辭義」，顯得無比諷刺。

明末大儒顧炎武評《史記》云：「古人作史，有不待論斷而于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。」⁴指史家雖未現身評論，直接介入敘事之中，然而，在其敘述的內容中即已暗寓無言的批評。司馬光自云其敘史目的在於「監前世之興衰，考當今之得失，嘉善矜惡，取是捨非」(〈進書表〉)，而其手法則在《資治通鑑》魏文帝黃初二年的「臣光曰」中有所說明：「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為勸誡」(卷 69)，蓋將其褒貶評價透過史料組織、敘述技巧，巧妙融合於歷史敘事之中，使讀者自行領略，「詔書」之運用，特其一例而已。

⁴ [清]顧炎武：《原抄本顧亭林日知錄》(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79)，頁 737。